动态·书评

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下）

[美] 何炳棣 译者 张勉励

如果把中国视为处于汉文化和制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之下的势力范围，那么其领域将更为广大。自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到1279年忽必烈征服南宋，中国处于分裂状态长达五百余年。960年，北宋建立，此后的近一千年间，汉族显然在民族间的政权之争中处于劣势：中国北部的征服王朝契丹辽（916－1125）、女真金（1115－1234），以及位于中国西北边疆的唐古特西夏政权（1038－1227），都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蒙古元（1260－1368）和满族清（1644－1911），他们先后征服了整个中国。

与唐及唐以前相比，960年以后，主要民族的个数、以及有效的异族王朝和边疆政权的数目都已减少，其格局较为清晰简单，更容易被当代的学生掌握。但是，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数十年来的专门研究表明，上述王朝和边疆政权的出现，实际上是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诸多发展过程的结晶，包括各民族在其相应地域内相互之间的分裂、合并、重组及融合，这些民族都深深地植根于汉民族的历史之中。例如，契丹辽征服合并了奚、室韦蒙古，尤其是渤海人，他们曾在满洲的东南建立了高度汉化的政权。西夏，为唐宋之疆域，主要包括甘肃、青海和陕西北部，是唐古特、汉、回鹘和吐蕃相互之间数百年同化的完美结果，它的统治者被赐予唐朝王姓"李"和宋朝王姓"赵"。至于契丹人本身，他们从四世纪起就开始卷入中华世界；他们在骚扰唐东北边疆的同时，又忠实地效力于唐朝的军队。事实上，契丹将军李光弼正是以其在镇压安禄山叛乱中的卓越军功而获赐王姓的。显然，这些王朝没有一个是由"蛮族"建立的。

960年后的阶段，整体上说来，可以看作是异族军事的全盛时期，也可以视为人口数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这一变化却是有利于汉人的。北宋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欧阳修的著作，曾是我儿时的必读材料，其中一篇中的一段叙述让我深思，使我更加意识到长期的国内和平和从宋建立到欧阳修所处时期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之间的可能联系。① 事实上，关于经济和制度因素对于工业社会前人口持续增长的重要性，早就应该简要比较一下宋初和清初的情形。北宋统治下的和平时期（960－1125）较之清初的和平时期（1679－1796）几乎长五十年。就在清初的这段时间里，中国人口增长了一倍多，有三亿人，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可以说，与在宋代相比，汉人在清初享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清初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贫民的财政改革，包括永久性废除封建徭役和摊丁入亩。最近的观点似乎证实了我二十五年前得出的结论：北宋末年其人口已达到1亿。在蒙古大屠杀之前，南宋和北方的女真金的总人口必定大大超过了一亿之数。有关蒙古对中国的征

[收稿日期] 2000—04—20
[作者简介] 译者张勉励（1974－），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服战争及蒙古一个世纪统治下持续低水平的户籍人口的诸因素，尽管未被全面地认识，在最后的这个千年里，汉人在民族间的政权之争中的军事孱弱看来好象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人口优势的补偿，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

960年后的阶段，有两个主要的新因素值得我们的注意。1. 在唐代，吐蕃和位于今云南的南诏虽然也参与了民族间的政权之争，但直至十三世纪五十年代初，忽必烈武力征服了中国的最西南地区，他们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2.1260年忽必烈继汗位后，他开始建立与藏传佛教的共生关系。忽必烈扮演了藏传佛教的赞助者和保护者的角色；作为回报，藏传佛教则给他统治广大的多民族帝国的合法性赋于新的内涵，即称其为文殊智慧菩萨和寰宇之王。而且藏传佛教开始在西藏的长期稳定和统治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并在蒙古人中传播。早期的满族统治者，无论是在1644年征服中国之前还是之后，都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藏传佛教对于壮大实力和帮助统治广大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在我们审视960年后汉化的不同阶段的结果前，我须提及汉人在宋代、尤其是在南宋时期，其心理好象变得内向了。长期遭受契丹、唐古特及女真的军事威胁和凌辱，使得汉人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平民都变得越来越以汉族为中心，甚至有些仇外。初唐时那充满欲望和令人愉悦的世界主义一去不复返了。

在研究自960年到1279年蒙古征服整个中国这一阶段汉化的结果时，十分幸运的是，赫伯特·佛兰克（Herbert Franke）已对女真金作出了深刻的结论，我在前面已经有所引述。他的评论虽然是针对金的，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契丹辽和唐古特西夏。从他关于金的结论中我们了解到，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已灭亡的“异族”王朝的多民族知识分子的精英们，在最具掠夺性的征服王朝——蒙古元的统治下，却是标准的具有汉族正统思想的人，庄严地赋予自己相应的道义。下面这个感人肺腑的例子最能说明女真精英们完全彻底地转变成为“汉人”：杰出的汉文学家元好问，有感于在蒙古铁蹄下的悲惨命运，决心记录他原已覆灭的王朝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他所著的《中州集》等作品是重新构建金后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元好问多产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使许许多多优秀的汉族和女真文人不被人们所忘却。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他本人就具有曾为“蛮族”的拓跋魏的皇室血统。

有关女真平民汉化的资料很少，但仍有一些有价值的线索。1.1145年后，越来越多的女真军队（猛安谋克）开始在中国北方进行军事殖民，从而不断地与汉人混居。2. 自金朝兴，针对女真和汉之间通婚的规定是模糊不清的。虽然金世宗以其本土运动而著称，他还半心半意地试图将猛安谋克的官兵与汉族村民隔离开来，但并没有下令禁止女真与汉通婚。正相反，1191年晚春，中书机构奏陈于朝廷：汉族纳赋的农民与女真军户彼此间有时并不友善；鼓励他们相互通婚将有益于国家的稳定。结果金章宗同意了这项提议，彻底屏除了对异族通婚的忧虑。在金朝实际上很早就已存在异族间的通婚，只不过不那么突出醒目而已。3. 即使面对蒙古人的优势兵力，女真军队依然誓不投降。女真人自然成为蒙古人的首批屠杀对象。蒙古人的残暴，使得女真兵民采取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伪装成汉人，包括改换汉族姓氏和服饰。换句话说，到女真金完全陷落于蒙古时，“彻底”汉化就成为女真人得以幸存的必要手段。4. 蒙古元朝广泛的民族社会等级体系，也许最能反映女真彻底或几乎彻底地汉化了。其中第三等级是“汉人”，包括原金统治下淮河以北的汉人，及在忽必烈征服南宋、契丹、女真、朝鲜和渤海数年前即已征服的四川和云南的居民。

蒙古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成功地缔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由于其游牧和掠夺性的生活方式、萨满教的宗教信仰和相对原始的文化，蒙古人实际上乐于接受各种文化的输入。在某种意义上，元代中国的“世界主义”可以与唐代中国相媲美，除了一点，在元代，“世界主义”主要是单向流动，也就是说仅仅是接受和适应的导管。众所周知，在所有的征服贵族中，蒙古统治上层是最不易于受到汉族生活方式影响的，只不过在蒙古人征服中国时，面对被统治的是其人口百倍还多的汉人，就有必要采取汉人传统的帝王观念和官僚体制。

幸运的是，陈垣（1880－1971）的经典之作为我们研究元代统治上层的汉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元西域人华化考》1935 年出版，1966 年出版英译本 Western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Their Transformation into Chinese。由于现存的元代著作种类较多，数量也不少，而且特别归功于陈垣少有的博学多识，我们已经有了关于十三和十四世纪 132 位西亚和中亚人的可靠资料，有些还十分生动和详细。这些人或者擅长文学和艺术，或者在对儒教、佛教和道教哲学或宗教及关于礼仪的各种古典著作的论说方面颇有贡献。这些穆斯林和景教徒中有不少人放弃了他们原本的信仰而选择儒家的生活方式，包括遵守三年的丧服期。有时他们的女眷也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包括强剂量的程朱新儒学对妇女的训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随着元朝的灭亡，一些高度汉化的妇女们在战乱期间就遵从程朱儒学的训示殉节了。

根据元朝的规定，所有西亚和中亚人，也就是所有那些来自西域的非蒙古、汉、女真、契丹等的其他民族被归入色目人。至于陈垣研究的这 132 位色目人的族源，其中 23 位总的说来是西域人，8 位被称作也立可温（厄克温，景教徒），但没有逐一说明。其余的，除了 8 位唐古特人、2 位乃蛮人和 2 位阿拉伯人外，好象都是突厥人，其中至少 68 位是维吾尔人。维吾尔人在元代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公认的事实，他们在色目人中占有文化上的优势与这一点是一致的。

一些色目人的精英们不久就对汉文化产生了由衷的崇拜之情，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更不用说还有许许多多的从事各种生计的突厥及其他色目人，如士兵、商人、信差、文书、翻译、教师、小官员和学者、工匠、僧侣和游历者，没有留下任何记载。镇江，位于南京以东 75 公里，其史志中有一份难得的户籍记录，说明了它在 1330－1332 年间的民族构成（见表一）。

表一　镇江的侨寓居民，1330－32

	户	口	丁	总计
总数	3,845	10,555	2,948	3,503
蒙古	29	163	429	592
畏吾儿	14	93	107	200
回回(穆斯林)	59	374	310	684
也力可温	23	106	10	215
河西	3	35	9	54
契丹	21	116	75	691
女真	25	261	224	485
汉族中国人	3,671	9,407	1,675	1,082

来源：（至顺）《镇江志》，转引自罗香林著《唐元二代之景教》1966 年香港版；韩儒林著《元朝史》补充。

各种非汉移民（侨寓）占暂住人口的 17.93%，这个比例当然不低。但当我们将其与镇江常住户的总数(100,065)——这表明其总人口大约有 50 万——进行比较时，那么 2411 个非汉侨民，仅占镇江总人口的 0.5%，真是沧海一粟而已。虽然蒙古和色目人在京城、省会和军镇卫所中占有相当比例，但在广大的农村腹地不可能见到许多的异族人。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汉人在数量上的压倒优势，是确保其长期地汉化异族的征服者、多民族的统治阶层和形形色色的平民大众的非常基本的生物因素。

不过，蒙古学家亨利·塞莱斯（Henry Serruys）提醒我们注意一点，异族特别是蒙古人中普通百姓的汉化过程可能比我们通常设想的要慢的多。尽管元代也有例证，像蒙古人改用汉姓，以及众所周知的蒙古平民在国内外被贩卖做奴隶，但塞莱斯所言蒙古人仅仅在明代才开始真正汉化当然是正确的。他说："他们在数量上太少，不可能无限地抵制周围汉人的影响。"1391 年民族间的婚姻法，或许有助于加速明代蒙古和色目人的汉化：

> 蒙古和色目人可以与汉人通婚。但他们不得与同族通婚。违者杖责八十，罚充官奴。(《明律集解附例》)

理论上讲，通过法律强制异族和汉族间的通婚，这项法令应该会加速汉化的进程。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现了规避这项法令的成功事例，并有异族人借改汉族姓氏来使族内通婚合

法化的例子。我们还须提及某些明朝复仇主义的措施——仅保存在私人撰述和家谱中——例如禁止那些在蒙古征服时期背叛宋朝的异族后裔参加科举考试，但并未得到有效的实施。

我们现在来探讨：清作为征服朝廷，其成功是否归因于体系上的汉化政策；在评价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时，拒绝汉化观点的所谓新动向是否是有理性的，是否是正确的。这里，我再次把我三十年前关于汉化论述的要点提出，大家可以对之进行严格的、学术上的验证。

满族皇室、贵族和官员从体系上的汉化可以为以下事实所证明：

> 从王朝建立之初就完全采用明代的政府体系，满族人稍稍有所革新，使之得以改进和更加合理；康熙帝及其后继者强烈地拥护宋代晚期新儒学中关于社会和政治诸关系的保守和消极的方面，使之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清帝王前所未有地向孔夫子行礼（在北京行两跪三叩首礼，在孔夫子的诞生地曲阜行三跪九叩首礼）；主要以正统儒家思想为基础，规定并一直坚持对皇子们进行严格的中国史教育；利用儒家的正统思想作为正当理由，来废除满族本土的八旗制度中各阶层间的封建关系；在朝廷的赞助下，大规模地印刷和传播古代经典著作、程朱新儒学的作品、文学参考工具书和选集，终至汇编成为《四库全书》；以及越来越痴迷于汉族的文学、书法、绘画和各种娱乐形式。
>
> 像康熙、雍正、乾隆那样的非凡统治者，都认识到保持某些满族的特性和习俗的重要性。不过汉文化的熔炉是如此的高效，以至于虽然萨满教似乎一直存在到了清朝完结之时，但皇室所倡导的本土主义到十八世纪后半期，最终仅仅是皇子们和满族科考候选人的法定义务，他们必须要练习骑术和射箭，并学习满语。有确实的证据表明，至迟到十九世纪初，即使对皇子们来说满语已经变成死语言了……事实上。满族汉化的程度相当之高，因此，我们所认为是正统儒家政权和社会的，不仅以先前的汉族王朝为代表，还包括清王朝。当 1851 年太平军起义时，清朝面临严峻的考验。因为这个所谓的异族朝廷实际上比前代的汉族朝廷都更加地信奉儒教，所以汉族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关键的社会阶层——文人学士和官员，都衷心耿耿地为他们的满族统治者而战。

尽管我十分理性地相信，我三十年前提出的这些清代汉化的观点，总的来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我仍有必要对我当时必须简练的论文加以一些详细的说明。我须详述的第一个要点是：自从王朝的创建者努尔哈赤（1559 - 1626）时期就有不成文的祖训，对皇子们来说刻苦学习汉文学和历史是十分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至少使他们充分地明了造成王朝兴衰的基本因素，我认为清朝在这方面是始终一贯的。不寻常的经历使得努尔哈赤年轻时就精通三种语言——满语、汉语和蒙语，并能洞悉腐朽的明廷的弱点。[②]他和后继者皇太极都意识到保存满族特性是明智之举，但他们更加明白知识就是力量，并且拥有这种力量的关键就是汉语。满族文字的创立，与其说是满族本土主义的标志，不如说是一种获取新知识和通过翻译越来越多的汉文古典作品、历史、文学和科技著作以提高满族文化水平的手段。

康熙（1662 - 1722 在位）是第一位沉浸于汉文古典著作和历史的满族皇帝，因而也是第一位对汉文化产生真正的倾慕之情的满族皇帝。他立下规矩，要求所有的皇子须在严格的监督下接受数年的汉语教育，这项规定一直被严格地遵守到王朝灭亡之时。据著名的历史学家赵翼（1727 - 1814）回忆说，他于 1756 至 1761 年间任军机大臣时，被那熟悉的景象深深感动——天刚破晓，皇子们就在灯笼的照引下前往宫廷学校上课——这使他充满了无限的景仰之情，并说前代没有哪一个朝廷能比清廷为皇子提供的教育更好、更严格。赵翼还说道，年轻的皇子们一年之中几乎没有假期，没有多少普通人能像满族帝王那样为他们的孩子制订如此严格的教学时间表。那么，也就难怪清统治者中出了不少颇有学识之士。雍正帝（1723 - 1735）的书法和明晰的散文部分地呈现在其有名的、数量众多的朱批之中，博得了

我的老师、这个世纪一流的汉学家陈寅恪(1890－1969)的钦佩。乾隆帝（1736－1795在位）作为一位多产诗人，一生中创作了42,000余首汉文诗歌，也许堪称是世界记录了。

康熙将儒家思想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重要性不能被估计过高。虽然从西汉起儒家思想就愈来愈被奉若神明、受人尊崇，其主旨总是坚持认为，活着的帝王不应像其臣民尊敬他一样尊敬儒教。康熙帝为了显示他对儒家思想的真挚崇拜之情和深深的感激之情，打破所有的历史先例，向孔子的牌位行叩头礼。如果这还不是“汉化”的最高程度在仪礼上的表现，那我就不知道究竟什么才算是。众所周知，宋代的《百家姓》中皇室赵姓排第一位。明代的《千家姓》中排第一位的是皇室朱姓，却不太为人所知。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康熙钦定百家姓》中儒家孔子的姓氏排在了首位。关于使清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称得上是儒教朝廷的理论基础，雍正帝在1723年给出了最坦率、最权威的解释：

> 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即端，而受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

我请所有清史的学生，特别是罗斯基，逐一地反驳上述汉化历史上的事件和仪式，逐一地反驳清朝主要的缔造者在使空前的提升儒家思想——汉化的精髓——合理化时的言行。必须再次强调指出的是，清廷全心全意地倡导并努力付诸全面实施的是儒家思想的其中一派——程朱新儒学。我在1968年的论文中涉及的一点，后来亚瑟·F·莱特（Arthur F·Wright）非常好地作出了进一步阐述：

> ……新儒学不仅结合现实修订了儒家思想，而且添加了数个世纪前更宽容的、无定形的儒家思想所没有的强制性规定。正是新儒学，才坚决主张性别隔离和妇女的绝对附属地位。正是新儒学，才逐渐地将“忠”的定义从原来的最终由臣民的良知决定的关系，改变成为对所有统治者——不论他有多么的愚蠢或无道——都无条件地绝对服从的强制义务。鉴于新儒学赋予君主统治所有个人及公共道德习俗和根除异端邪说的权威，它比旧儒学更具极权主义的意图。怪不得后来的帝王从中找到合理根据，将原来与文人学士分享的权利越来越多地集于一身。

康熙朝初期，政府开始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程朱正统政治和道德思想的通俗版本，无休无止地劝诫国民。孟森教授对清初的前明忠臣义士的生活和情感的认识可能是最深刻的。他认为，当康熙帝诏令地方政府荐举当地有名望的学士，参加1679年春为他们安排的特别廷试时，即使是最“坚定的”忠明之士的心也被软化了，因为他们很清楚，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中国的统治者能像这个皇帝那样信奉儒教。

正是这种体系上的汉化政策，使满族统治者博得了其臣民的绝大多数——汉人——的衷心拥护，并进而引领全国进入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繁荣和人口增长时期，终于为三代杰出的满族君主创建和巩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提供了所有必要的基础。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意识到合并蒙古是征服中国的必要举措，于是在发动全面入关战争之前数年，就充分利用蒙古的内部纷争，确立了满族对蒙古的领主地位。早在1636年，满清建立专门机构管理蒙古事务，1638年更名为理藩院。对蒙古的政策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形成，持续贯穿于1644年以后的时间里，并得到补充发展，包括满族皇室与蒙古王公之间长期的联姻关系、定期授予蒙古各阶层统治阶级以贵族爵位、划分相互“隔离的”基本的行政单位——和硕（旗）由世袭的旗长管辖。历史悠久的蒙古部落领地，只保留名称，被清廷改设为盟，每三年会盟一次，但除了调节旗内的纠纷外几乎没有真正的权力。内蒙古所属有六盟，外蒙古所属有四盟。其他毗邻的战略要地都处于清政府更直接的管辖之下。从行政管理上来说，清对蒙古“分而治之”的政策是成功的。

虽然东蒙古——内、外蒙古——被按计划纳入了满族的控制，但西蒙古，主要是蒙古和突厥的混血，通称厄鲁特（卡尔梅克），却对清廷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十七世纪后半期准噶尔是厄鲁特诸部中势力最强的一支。噶尔丹统治时期，准噶尔控制着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及

青海和西藏。噶尔丹一方面靠俄国人提供的火器和铠甲，特别是依仗准噶尔人自己有能力大量制造性能先进的火炮；另一方面，则借藏传佛教黄教派的虔诚支持者的姿态，屡屡侵犯内、外蒙古。于是，康熙帝亲自制定主要的战略对策，经过细致的后勤准备，发动了对西北的一系列远征，最终瓦解了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则于 1697 年毙命。实际上，早在 1691 年的战事中，在内蒙古东部的多伦诺尔，康熙接受了所有蒙古高层头领们的宣誓效忠，他不仅被尊为他们的领主，而且还被认为是他们的拯救者。这个仪式奠定了在清朝其后的岁月里满族统治者对蒙古人不可动摇的威望。

然而，西藏不断发生阴谋事件，局面并不稳定；噶尔丹死后，其他的厄鲁特首领也依然野心勃勃。雍正帝和乾隆帝不得不继续派出远征部队，最终征服了西域和青海的广大地区，并使西藏成为其保护领地。所有这些征服都是在十八世纪末之前完成的。关于主要事件和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民族地区建立的多样化的行政管理制度，已有了研究成果;③而我这篇论文必须围绕评价非凡的清朝帝国构建对中国的整体影响。

约瑟夫·福雷切（Joseph Fletcher）宏观历史学的观点对我研究的论题很有帮助：

> 1800 年之前清朝历史的焦点在内陆亚洲——它的征服、政治活动、以及这个广阔的、多元文化的地区被统一的、不断汉化的中华帝国所并吞和消化的过程。1800 年之后重点开始转向中国内地和沿海。十九世纪清内陆亚洲开始慢慢地被纳入扩张中的中国版图，并开始置身于汉文化的影响下。

俄国东进的扩张从中亚一直到了濒临太平洋的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中英之间爆发了鸦片战争；中国国内自 1796 年后兴起了一系列的动乱和起义，到 1851 年太平天国爆发时达到了高潮，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内战争，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众所周知，无须再费笔墨。因此，显然满清朝廷不仅需要汉族精英们的集体智慧和献身，还需要纯粹的迅速恢复元气以及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其人口 1800 年达 3 亿，1850 年达 4 亿 3 千万——来挽救其命运。必须提及的是，即使在康熙对蒙古的多次远征时，就已有迹象表明八旗军队战斗力正在衰退，而汉族绿营兵的作用在增强。平准后不久，清廷即对准噶尔地区实施殖民政策，该地域有大片的适于耕作的土地。殖民有多种形式：有汉化的东疆穆斯林、汉族绿营及其家眷、八旗军及其眷属、汉族遣犯及流人，还有政府通过向每户提供 4.5 英亩（30 亩）的土地从中国内地吸引来的汉族民户。截止至 1800 年，据说仅乌鲁木齐周围地区的汉族移民的数目就已比 1775 年入籍登记的72,000 人增加了数倍之多。在准噶尔原有的和新建的城镇周围，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边缘的绿洲城镇里，汉族和东干（甘肃和陕西的穆斯林）商人在地方和区域贸易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些措施仍不足以保持这个民族和宗教信仰都异常复杂的辽阔地区的稳定和抵御俄国无所不在的威胁。

正是在蒙古，满族的政策和满汉间的默契所得到的结果，超出了他们美好的愿望。先前已经指出，康熙及其后继者为内外蒙古建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十分的有效。但也正是清廷在蒙古推行藏传佛教黄教派的宗教政策持久地削弱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生畏的军事征服者的后裔们。福雷切进一步阐述道：

> 十九世纪，这个王朝控制着蒙古，清政府不再惧怕他们。甚至蒙古的人口，也主要由于僧侣制度和梅毒而锐减……清在蒙古的利益日益变成了汉人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汉人的经济渗透是服务于朝廷的利益的，因为它将蒙古与帝国的其他地方紧密地联系起来。

由于其后的经济连锁反应，蒙古受害更甚。蒙古贵族和喇嘛们负担沉重的债务，被迫非法地将大片的草场抵押给汉族商人。汉族商人则带来越来越多的汉族农民把草场变为更有生产力的农田。在与日俱增的财政负担和不断缩小的草场面积的双重压力下，蒙古平民脱离了他们传统的游牧生活，日渐贫困。尽管清代法令规定禁止在蒙古转让草场，已处在下坡路的清政府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蒙古，特别是内蒙，越来越“汉化”了。

康熙帝惟一短见的政策表现在对他的发祥

地满洲的问题上。1688 年他决定隔离整个满洲，使之成为满族独有的保留地，尽管来自中国北方省区——山东、直隶（河北）和河南——的汉族移民，特别是在饥馑荒年，经常违反禁令，满洲的汉族移民总数至十九世纪中期仍是十分有限的，东北满洲依然是一个势力真空地带。直到 1860 年，沙皇俄国强迫清廷割让了阿穆尔河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约350,000 平方公里的领土，汉族移民满洲才成为国家急切关注的问题。所有禁止汉人迁徙满洲的法令被取消，之后于 1907 年，满洲被分设三个省，此时满洲总人口约有一千七百万。其后汉族移民使满洲人口翻了一番，1930 年日本入侵前一年，达三千四百万。在帝国主义列强全盛时期，对于晚清和早期共和中国来说，保住满洲的唯一办法，就是我们所称的汉化最基本的方式，即用千百万的汉人充实该地区。

1851 年太平军起义的爆发，不仅全面揭示了八旗军事体制的废弛，也迫使清廷转而依靠汉族官员和士绅的集体才智和忠诚来挽救局面。恰恰是在这个危急关头，已经实施了两个世纪汉化政策的满清朝廷，收获了它最大的奖赏。为回应太平军平均主义的伪基督教信条——它从根本上推翻汉族传统的价值观，曾国藩（1811－1872），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倾向于清代思想家中的治国派，实际上代表整个汉族统治精英，于 1852 年郑重宣称，其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上与满清王朝是一致的。结果证明，由曾国藩自 1852 年试组、训练并领导的湘军，是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惟一有力量的军事单位。“湘军”的主要力量存在于指挥官、军官和同乡士兵之间强固的私人纽带关系。受曾国藩部队功效的鼓舞，长江流域的其他省份也很快组办“团练”。团练完全由汉人统辖，并逐渐近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团练标志着主要军队体系的“汉化”过程的开始。

虽然汉族政治家和将领们延续了清王朝的寿命，但太平天国后清朝仍面临一大摊的国内外问题。从我们的研究论题看来，最严重的问题莫过于 1862－1877 年间的有国际牵涉的西北回民（汉族穆斯林）大起义。阿拉伯、波斯和其他中亚穆斯林精英们在蒙古人一个世纪的统治下，自发地接受了汉文化和价值体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清代陕西、甘肃和新疆的穆斯林生活在教坊制度下，严格遵守他们的宗教戒律，并将自己与汉人隔离开来。而且，虽然苏菲派神秘主义自从十五世纪就已经零星地传入中国，但它开始对中国、特别是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产生巨大影响，仅仅是在清代中叶以后。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建立苏菲教团的穆斯林教长们实际上变为地方或地区宗教世袭统治集团的创始者，享有对教义和行政管理事务几乎绝对的权威，拥有大量的地产，并收取“什一税”（未必就是十分之一）和虔诚信徒的各种形式的贡献。职位和特权由“神圣领袖”家族世袭。到十八世纪后半期，中国人开始称这类家族为“门宦”，字面上的意思是“官宦家族”，实际含义是“穆斯林权贵家族”。④

两个最著名的门宦都在甘肃和陕西交界处。其中较早的由马来迟（1681－1766）创建，较晚的由马明心创建。两位都在国外——麦加和其他伊斯兰教中心——经过了多年的学习。前者在其势力顶峰时有200,000 名信徒。后者是原教旨主义者，亦有改良主义倾向，在 1741 年返回中国后不久就创建了“新”教派，宣扬更简单、更纯洁的礼拜仪式，包括批判那些世袭既得利益集团。1761 年后，他的追随者开始迅速进入马来迟的势力范围。一系列的冲突最终导致了 1781 年的严重流血事件，清政府出动军队进行武装干涉，处死了马明心和其门徒中的主要闹事者。这次悲剧事件使马明心成为殉教圣徒，他死后的影响波及甚广，他的第五世孙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陕西和甘肃回民大起义的轴心人物。汉族穆斯林社区间旷日持久的纷争和仇视、1762 年后对穆斯林的歧视性法律、穆斯林固有的对异教徒的憎恶和被抑制的分裂主义的冲动、1862 年太平军迅速插入陕西腹地，所有这些造成了陕西、甘肃和新疆回民大起义的爆发。

解决西北、特别是新疆——清内陆亚洲帝国最脆弱、到目前为止也是最紧要的部分——危机的任务再一次地落到了汉族政治家、将领和士兵，尤其是左宗棠（1812－1885）及其湘军的肩上。陕西和甘肃战事的持久主要是由于清军不得不去攻占数以百计的穆斯林围栅和筑

有防御工事的村庄。直到1873年末两省的穆斯林反叛者才被肃清。但新疆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南疆，维吾尔穆斯林地区，已经被入侵者阿古伯控制，他是浩罕军队的一位前军官，与许多伊斯兰政权都有广泛的联系；俄国也乘机混水摸鱼，在1871年军事占领了伊犁地区。日本于1874年春迅速入侵了台湾，从而激起了清廷中海防派和主张先收复新疆的一派之间的大争论，结果左宗棠的军事行动不得不拖后一年多的时间。1875年初，左宗棠终于占了上风，开始他的远征。由于他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谨慎周密的计划、总计达五千一百万两的两笔巨额外债，还有获得了足够的克鲁伯攻城炮，他的军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任务——多数西方势力包括俄国在内原本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只有伊犁是在1881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的确可以说，是左宗棠的汉族部队保住了这个经过满清三代帝王康熙、雍正和乾隆的苦心经营才缔造出的统一多民族帝国。

新疆，由于其民族、宗教的异常复杂，一直是行政管理的难题，最终在1884年设立为省——这一举措可以被认为是行政管理上的汉化。当然，尽管使得千差万别的行政管理机构合理化，将控制权集中到新设立的总督衙门，并继续稳固地、大规模地迁移汉民入疆，这个面积辽阔的省域还远称不上被汉化了。不过，在行政管理上，新疆被内地化了，即被纳入了中国领土省的区划中，这一事实却必定有其精神上和国际法上的效用。由于类似的、但更为紧迫的原因，1907年满洲被分设为三个省。清内陆亚洲其它地区“内地化”的进程，因为1911－1912年王朝的覆灭而中断了。但当军阀割据时期一结束，国民政府于1928年又开始继续原来的行政管理上的汉化过程：在东藏地区设立西疆（西康）省；健全青海省；将内蒙古转化为三个省，即热河、察哈尔和绥远。由于国内的虚弱和国外来自俄国、英国和日本的威胁，晚清和民国除了执行行政管理上的汉化方案——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姿态而已，并没有政治和经济实力作后盾——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保住其重要的民族地区。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里，中国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和日本那里不断地接受教训，明白对于其周边领土的主权需要有有效的管辖权证明，归根结底则是需要有能力用军事力量保卫它。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中国最终证明她有能力维护其内陆亚洲领土的主权，并因而彻底推翻了上个世纪外国对中国作出的政治无能的评价时，这些外国又有人开始非难中国的力量，借以干涉其国内的少数民族事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内蒙、宁夏、新疆、西藏和广西五个自治区的建立，从理论上逆转了在过去国家虚弱和屈辱的六十年里对主要民族地区实施的行政管理上的汉化过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能力、有决心捍卫其领土完整。

满族的汉化伴随着清内陆亚洲帝国的兴衰，关于其发展阶段和不同方面的讨论十分清楚地表明，汉化和帝国的缔造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两种力量。清代空前的繁荣和人口增长——的确主要是清初体系上的汉化政策所造成的，包括实施一系列合理的财政改革——为满清卓越的三代统治者缔造和巩固中国历史上最广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当1800年后清内陆亚洲帝国开始衰败、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王朝的灭亡似乎迫在眉睫时，清政府依靠全体汉族精英的才能和忠心，并采取各种可以想到的汉化形式，包括大规模地向民族地区迁入汉人，来使这个多民族帝国和王朝免于崩溃。

十九世纪后半期，随着国家危机的日益加剧，满族和汉人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感——都是“中国人”，身处同一条船上，挣扎着航行在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惊涛骇浪中。直到慈禧太后当政的满清朝廷一再明显地表现出它完全没有能力克服自己的惰性、也没有能力“自强”图新，特别是在1895年中国为日本战败、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中国遭受更为深重的屈辱之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发动革命，旨在推翻满清朝廷。总的说来，在清代多民族帝国的缔造和其体系上的汉化从不是正相反的两极。罗斯基犯了双重错误，一是由于她的无知，或是不愿意深入地研究整个政策框架中主要的两个支柱之间紧密的相互关系，二是因为她曲解了我多面性的论题，而我的论题清楚地阐明了这两者之间的互补性。

在罗斯基发言的最后，她作了另一个归

纳：

> “汉化”——该论断是说，进入汉人地区的所有非汉民族最终被汉人文化同化——是二十世纪汉族民族主义者对中国历史的诠释。

从历史编纂学来说，她的陈述需要严肃的评定。根据《牛津英语词典》，“sinicize（使汉化）”和“sinicization（汉化）”最初分别出现在1889年9月18日和1895年11月26日的《文艺协会》（Athenaeum）上，都是关于日本的语言、宗教和文化的。实际上，中国游牧征服者不可避免地被汉化的观点似乎已经一再被许多杰出的汉学家和语言学家解释说明，如亨利·余鲁爵士（Sir Henry Yule）（1820－89），爱多亚德·切万尼斯（Edouard Chavannes）（1860－1916），奥瑞罗·斯坦爵士（Sir Aurel Stein）（1862－1943），特别是保罗·派利奥特（Paul Pelliot）（1878－1945）。陈垣，一流的天主教福建大学的校长，在其研究助手的帮助下，密切关注着法国汉学。我猜测，正是得到了派利奥特的启示，他在1935年出版了他关于蒙古统治时期西亚和中亚人汉化的著名研究成果。

回顾当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甚至没有学者和学生听说过陈垣的书，因为实际上日本军队的前锋距北平仅有200公里，我们所有人都在为此忧心忡忡，而不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教化她的草原征服者那不可抗拒的力量中寻找慰籍的时候。我们清华大学的数百人都在仔细思索雷海宗教授（1902－1962）高度自我批评的宏观历史学的观点，皇朝时期的中国怎样又是为什么应被称作一个“没有士兵的文明”，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反复地被欧亚大草原的民族部分地和全部地征服。⑤

六十年后，带着对传统中国文明基本弱点的充分认识，我试图作出以下关于汉化的总结概括：

1．虽然伟大的欧洲汉学家和语言学家们总结中的异族征服者汉化的不可避免性的方式，在今天看来，显得有点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不能就此否定他们将中国文明对比历史上东亚和东北亚的其他文明、依据其取得的成就和内涵的丰富程度所作出的对中国文明的根本力量的总的评价。在过去的百年里国际上对中国的研究，总的来说是肯定而不是驳斥了他们的评价。我们可以在《剑桥中国史》（1978）的总编辑序中找到公正、客观的评论：

> 中国文明的历史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历史都广博和复杂，仅仅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微小一点。

老的汉学家的观点听起来很陈腐，但真理和近乎真理经常令人觉得陈腐。

2．汉化固有的力量似乎终极源于中国人以人为本的信仰，其核心是祖先崇拜。古代中国人的信仰，是将对生理和社会不灭的关注由“自己”推及“异己”，从根本上不同于古代西方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具有排外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特征。中国很幸运，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穆斯林反叛，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任何“圣战”。在长期的不同民族间和不同信仰间的接触中，中国人谦逊、没有偏见、心胸宽广，总是给有思想的异族留下良好的影响。传统中国“灵魂”中的“博大”完全能解释为什么汉化通常是自发的而非强迫的⑥。否则，就难以设想这一事实，1990年中国的人口普查显示生活在其具有战略地位的内陆亚洲的少数民族仅占中国人口的3％；罗斯基仅专注于清代的那些族群，只能将她的论文引入死胡同。⑦

汉化的力量和说服力部分地是由于虚心地、能动地借用外来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及多方面的物质文化。一个最突出的例证就是，中世纪初期的中国因为佛教而印度化，但自唐代以后佛教最终被汉化了。已被汉化的佛教，其形而上学是宋代新儒学合成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化，从其更广泛的、合理的意义上来讲，远远超越了民族间关系的狭窄界限，而包含了整个中国文明的演化。

4．汉化是一个持续不停的进程，任何关于汉化的历史的语言学的研究最后必须要设想它的未来。在过去的200年里，汉化的影响力原来活动的范围，已从东亚和东北亚扩展到了全球；在全球，中国文明遭遇到西方文明，后者由于科技革命而更为强大。结果，在国际文明间的交流中，中国的角色已从原来的“施予者”变为“接受者”。虽然中国在一百年中现

代化的努力是有限的、且为时已晚，但自1978年中国的全力以赴和决心已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于有预测说，在今后的数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实力将是世界最强的。没有人能准确地预测出到2025年中国会是什么样。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将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现在到那时，中国的传统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理论及意识形态，自愿地、抑或不自愿地被引入中国，它们将被测试、筛选、消化和吸收，这样才能合理地、很好地适应中国变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要经历汉化的过程。因而，汉化有其长期存在的意义。

记住“汉化”即英文“sinicization”对应的汉文译释是好的，但不完全正确；真正正确的汉文译释应是“华化”，因为汉化的力量早在汉朝建立前的数千年就开始运作了。

罗斯基也许更应该有益地开始探索目前汉化在中国历史上的进化作用——既然当代中国忙于重新界定其与西方的文化关系，汉化就与西化和现代化有了新的关系——而不是随便地、舒适地安于时下时髦的“文化批评家”派，机械地用空论代替学识和历史的洞察。

译者注：因篇幅所限，以下文中注释节略，文后所附参考书目亦未收录。Ping - ti Ho（何炳棣）所撰此文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刊于《亚洲研究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57卷第1期，1998年2月，P123 - 155，译文发表已获许可。

①这篇作品是“丰乐亭记”。《剑桥中国史》第六卷的撰写者关于宋、辽、金人口问题的观点与我的几乎完全一致。

②努尔哈赤还是少儿时，就已经在明边境的互市上初次接触到了汉人和蒙古人。其外祖父是一位有势力的满族头领，经常骚扰明朝边境，努尔哈赤与他一起生活，后来为明将李成梁俘获。李成梁处死了努尔哈赤的外祖父，却几乎把努尔哈赤当作他的养子。于是在其后的三年里，努尔哈赤一直在李成梁左右，去了许多地方，并数次到过京城。努尔哈赤一定通晓汉语，因为他后来回忆说，他是从著名的汉文小说——《三国演义》和中国的“罗宾汉”系列——《水浒传》中学到基本的军事和政治策略的。而当时满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这些小说才被译成新创制的满文。

③约瑟夫·福雷切（Joseph Fletcher）以中国和西方资料为基础作出的综合评述依然是最好的，参见《剑桥中国史》第十卷：晚清，1800 - 1911。王钟翰著《清代民族宗教政策》对清复杂的内陆亚洲政策和行政管理制度作了最简明扼要的分析。有关西藏的文献，数量巨大而争议颇多，但路西亚诺·皮特切（Luciano Petech）著《西藏的贵族政治与政府，1728 - 1959》被公认是最有学识、最客观和最公正的。

④“门宦”这个专门词汇直到十八世纪后半期才产生。第一次出现是在1897年春的清廷公文中。因而已被目前研究中国穆斯林的作者使用的“门宦”一词，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也许出于礼貌，西方著述中国穆斯林的作者避免提及门宦是反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

⑤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似乎总是能够忍耐得住来自欧亚草原最强大、最野蛮的游牧集团的攻袭带来的压力。

⑥香港大学罗香林教授对两个阿拉伯家族长期汉化过程的个案进行了研究。蒲氏家族可以追溯到900年前，十一世纪五十年代的北宋时期。罗教授以蒲氏家谱、墓志铭和各种文学作品为基础，并且访问了蒲氏后裔，写成《蒲寿庚研究》，远远超过了此前日本学者的研究。这部书后附载了福州的萨氏家族，该家族历史可以上溯到十三世纪忽必烈统治时期。这些个案研究，有力地证明了阿拉伯人吸收中国文化和适应典型的中国环境的能力。亨利·塞瑞（Henry Serruy）著《明代甘肃的蒙古人》（1955）（实际论述年代跨至本世纪初），虽然性质不同，但同样很有启发性。其文说明明政府从未付诸武力来强迫同化居住在中国西北、处境窘迫但为数不少的蒙古人，而是依靠长期的自然力演进这一汉化过程的。

⑦众所周知，除了在新疆和黑龙江的小块“飞地”，1990年登记的980万满族人口中的大多数已经完全地与汉人成一体了。1990年人口普查结果中回族有860万人，其中新疆仅有大约60万。而且，有理由相信，现代化将促进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整合过程。那么就难怪罗斯基不得不模糊时间概念，而说她以少数民族为导向的论点“集中在清代的早些时候”。